

ZXFK 史海钩沉

# 抗战岁月里 中共与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交往

□ 郑亮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表示我国实业界有4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其中,范旭东、卢作孚都是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营企业家既要承担战争带来的损失,又肩负着支持抗战,发展生产的使命。为了团结民营企业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他们一道,追求和平和民主,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努力。

## 毛泽东重庆谈判结深厚友谊

1945年8月28日,在周恩来、王若飞、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乘飞机亲临重庆。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同国民党解决国内政治上、军事上的各项迫切问题,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统一。

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聚集着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人士。长期的战乱,他们的资产多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们经营的各种企业又受国民党官僚资本和买办势力的打击,处于备受压迫的境地。得知毛主席亲自到重庆,希望从毛主席那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纲领和工商政策,为自身的发展谋求一条出路。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与产业界人士会面,到会者有刘鸿生、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潘昌猷等。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副处长钱之光、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等作陪。茶会期间,毛泽东赞扬产业界人士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掠夺压榨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要发展民族经济,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民族工商业要靠民主政治来维持,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道路。

毛主席的讲话擦亮了产业界进步人士的眼睛,他们逐步认识了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纷纷表示要更加关心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为建设新中国贡

献力量。

毛主席与工商界人士交往的影响深入人心。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拥护和爱戴。9月的山城,依旧炎热。工商界人士担忧炎热的天气影响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他们想尽办法,及时地买到了电风扇,转送毛主席,表示一点心意。办事处同志感谢他们的好意,不肯接受礼物,耐心地作了解释,最后来客答应只收成本不赚钱,声明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

## 周恩来亲自亲为促团结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加强了对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领导。周恩来多次与工商界人士会见谈话,参观大后方民营企业,在公共场合演讲以及发表文章,宣传共产党政策主张,赞扬工商界的爱国热情,号召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担负起抗日救亡的责任。

1939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组织驻渝参政员参观内迁工厂,参政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观了自河南郑州迁到土湾刚刚复工的豫丰纱厂。1942年1月14日,周恩来同冯玉祥又乘土湾参观、视察战时后方最大的民营“渝鑫钢铁厂”,参观了产品,并题词鼓励:“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1942年以来,周恩来多次在“特园”邀集“火柴大王”刘鸿生、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古耕虞、宝丰公司经理康心远等人谈话,听取他们介绍工商界的情况,向他们讲解形势,勉励他们在困难中努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周恩来还利用参加“星五聚餐会”的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著名演讲。他指出:战后工业建设,首先需要政治的安定……中国今天不仅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所以工业

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今后应该改善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在税收和劳工问题上,关税的重心应放在保护民族工业上面。”

胡子昂后来回忆:“周恩来《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在工商界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使我日益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丢掉了对国民党一度抱有的幻想,进一步参加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浪潮中来,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大道。”

## 南方局经济组成统战“前哨地”

1940年12月,由周恩来亲自指导下的南方局经济组成立,许涤新任组长。经济组负责宣传党的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和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经济组成立初期,对民族资本家开展的工作比较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周恩来告诫许涤新:“要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你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就是为了坚持抗战,就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经济组一方面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统制和管制手段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掠夺和掠夺;另一方面收集、宣传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和主张,用工商界能够接受和熟悉的语言来发表文章,借助舆论影响,为民族工商业请命。

许涤新主动拜访胡子昂、潘昌猷、古耕虞、卢作孚等川帮工商界人士。还邀请古耕虞和一些出口商到曾家岩50号公馆,与周恩来座谈。古耕虞回忆道:“我开始与周恩来接触,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当时周恩来在南方局主持工作,常常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到上清寺‘特园’聚会。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常到四川畜产公

司来,向我了解出口业务方面的情况,有时也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交换意见。我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就是许涤新代为邀请的。”

## 《新华日报》:“抗战号角、人民喉舌”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党报,发表了大量阐释共产党的财政经济政策的文章,揭露、抨击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掠夺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家的经济政治斗争。

1941年7月7日,周恩来在《“七七”四周年》中写道,“官僚资本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及合作事业的发展,破坏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破坏了商业市场的正常贸易,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因此,他提出“主张扶助民族资本,反对官僚资本。我们必须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严格地统制对外贸易,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以大力扶助中小企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以力求自给自足。”

1942年2月20日,《新华日报》开辟《友声》专栏,专门刊登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的文章,为文化界、教育界、实业界等代表人物提供言论阵地。

此外,每年新华日报创刊利用创刊纪念活动团结各界人士。徐迈回忆道:“《新华日报》七周年纪念,在化龙桥报馆的球场上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招待柳亚子、沈钧儒、马寅初、陶行知等文化戏剧界、工商界各方面知名人士数十人参加。公开发出请帖,国民党方面的人也请,他不来也可以,来则欢迎,结果来的各界人士很多。”

与大后方民族企业家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性摆在第一位。正如皖南事变以后,时局的骤变和环境的险恶,周恩来等人坚守国统区,尽可能地争取时局的好转,表示“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最后一口气”。

# “九开八闭”的重庆古城

□ 唐治泽 冯庆豪

明代以前的重庆城,我们知道得很少。现在我们所能依据的,只是明初戴鼎筑的城墙、城门,明代以前的重庆城,由于史籍记载的疏略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其详细情况虽经历多次修葺,幸未有大变。而且其嬗变流传,不仅有史志记录,还有地图、摄影以及故老口碑,所以资料要丰富得多。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是以清代后期的资料来谈重庆古城的。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有价值的早期重庆地图是晚清张云轩绘制的《重庆府治全图》。这是一幅套色木刻印刷的彩色地图,图中标明了一百多年前重庆的城墙、街道、官署、民居、山川、河流、水陆交通等情况,相当详细。由于是当时人记当地事,所以可信度很高,为我们了解晚清时期的重庆城具体状况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幅图是2005年4月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复制回来的。张云轩其人史无记载,据图中说明只知道他是清河郡(汉魏置,治河北淮河或山东临清)人,好善画喜游。地图上没有注明绘制的时间,有人认为作于光绪十二年(1886),不知何据。

从其内容看,城内戴家巷有“美奥福音堂”,据民国《巴县志·宗教》和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重庆宗教:重庆基督教大事记》载,此堂为光绪七年(1881)美国传教士鹿依士所建,则图的绘制不会早于此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一张《增广重庆地輿全图》,此图署为刘子如绘,并谓是“就云轩张君旧图扩而充之”。此图长江中画有“立德轮船”,而据立德《扁舟过三峡》一书记载,他是1898年3月驾“利川号”轮船首航重庆成功的,这在当时的重庆是一件大事,则刘子如绘制时间的上限当在其时。而刘氏既云所据为“旧图”,则张云轩图绘制的时间距刘子如图已有相当时日。据此,张云轩图绘制的下限应在1898年之前。所以我们只能谨慎地说,这幅精美的地图约绘制于1881—1897年,并且在19世纪80年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重庆府治全图》中标示的城墙,基本上就可以看作是戴鼎所筑。戴鼎之城的最大特征就是“九开八闭”之门。哪九开?朝天、东水、太平、储奇、金紫、南纪、通远、临江、千厮诸门;哪八闭?翠微、金汤、人和、凤凰、太安、定远、洪崖、西水诸门。一开一闭相间排列,但在储奇门和金紫门之间无门,以合八闭之数。开门都比闭门大,且有城楼建筑,多数还有瓮城。这些门有的是新开的,有的可能是原来就有的。在以后的年月里,各门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色,民间有谚曰:

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  
千厮门,花色子,白雪如银;  
洪崖门,广船开,杀鸡敬神;  
临江门,粪码头,臭得死人;  
定远门,较场坝,舞刀弄棍;  
通远门,锣鼓响,看理死人;  
金汤门,木棺材,大小齐整;  
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  
凤凰门,川道拐,牛羊成群;  
金紫门,恰对街,镇台衙门;  
储奇门,药材行,医治百病;  
人和门,火炮响,总爷出巡;  
太平门,老鼓楼,时辰极准;  
太安门,太平仓,积谷利民;  
东水门,正对街,鲤鱼龙门;  
翠微门,挂彩缎,五色鲜明;  
复兴门,跑跑马,快如浮云。

谚中少了西水门,多了复兴门。这是由于民间对“九开八闭”的不同认识而导致的。此外也有其他版本,内容与此稍异,但大体意思差不多。各门的特色与重庆地势和交通条件分不开。重庆城建在半岛上,又是个山城,其地形是中间高两边低;东一南为长江河谷,比较低平,过去城区的主要繁华地段就在这里,称为下半城,中部突然升高,城就建在山梁上,称为上半城。北边临嘉陵江一侧江岸陡峭,早期的城墙可能没有建在江边。这里曾发现过一些汉代墓葬,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传统要求死人都要葬在城外)。这一带引入城内的时间,可能在彭大雅或戴鼎之时。因此城内交通并不方便,坡多坎多,道路复杂,尤其上下半城之间,多由又高又陡的石级相连,让人仰息抚膺。江边诸门,都是水码头,南来北往的货物,都选择在离市场、消费区、堆栈处较近或者交通方便的码头上下船,以减少运输费用。久而久之,就形成各门的特色。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会见各方面人士,图为他们在桂园门口送别来访的客人。



1945年10月,《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上的演讲词(作者供图)

# 忆“星五聚餐会”

□ 胡子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独占人民的胜利果实,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陪同下,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反复的斗争,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大大地教育和团结了各界人士,唤起了人民群众新的觉醒。

当年9月17日,毛主席在桂园接见工商界人士时着重指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道路。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方向,看到了前途,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当时重庆有个“星五聚餐会”,是由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组织的,主持人是张禹九的夫人张肖梅。张肖梅是宁波人,父亲是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是买办资本家。张肖梅曾在英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

张禹九的哥哥张公权是中国银行董事长,非常看重张肖梅这个儿媳。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欧阳执无(剧作家欧阳予倩的堂弟),用张肖梅的名义写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论文和西南各地的经济调查报告,由此,张肖梅成了有名的经济学者。西南实业协会是张公权支持的,张肖梅就以西南实业协会的名义发起组织“星五聚餐会”,参加的人多数是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厂家的负责人和四川的实业家、银行家。会员的政治倾向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标榜资本家不搞政治,而实际上聚餐会本身就是搞政治。

“星五聚餐会”有个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陈叔敬是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重庆牛奶场场长,是有名的资本家。吴味经是国民党政府花纱布公司的总经理,属于官僚资本,对外名字叫“福生庄”。干事会的任务是决定每次举行聚餐会时请谁演讲,以及吃饭点菜等事务性工作。他们标榜不左不右,因此请来的人很复杂,报告内容谈技术的居多,但有的人也谈政治和敌占区的斗争。

我和罗叔章同志参加了“星五聚餐会”。当时罗叔章同志是重庆制药

生产合作社主任,我是重庆合作金库一个分库的主任。“星五聚餐会”人会要求严格,会员条件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公司的经理、协理、襄理等,都是些大老板,职员不能参加。我们俩单位虽小,但都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据说因为我俩是妇女,张肖梅才同意吸收的。当时我们俩经济并不富裕,有时相聚餐会费都有困难,参加进去主要是为了做政治工作。

1945年8月下旬,徐冰同志(或是钱之光同志)对我说:“周恩来同志准备到星五聚餐会去做报告。”但按照“星五聚餐会”干事会的规定,请谁去做报告,要由他们出面邀请,不能自己说去就去。徐冰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罗叔章,让我们设法让“星五聚餐会”邀请周恩来同志作演讲。

我俩去找“星五聚餐会”的干事商谈,他们三人自我表明不左不右,对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感到有困难。我们提出,这次请周恩来,下次请陈立夫。他们表示对陈不感兴趣。我们说,对陈立夫不感兴趣,还可以请国民党其他人嘛!我与陈叔敬、吴味经都很熟,还曾经帮助吴味经解决过纱厂缺少困难,因此吴对我们有些好感。当我们再次提出请周恩来同志到“星五聚餐会”做报告的意见时,吴、陈二人就同意了。并决定在周恩来同志报告之后的下一次聚餐会上,由他们请从战区回来的王良仲做报告,以冲淡他们的“红色嫌疑”。干事会三人中,吴、陈两人表示同意,张禹九虽然反

对,也无办法。

请周恩来同志到“星五聚餐会”做报告这件事,事先向会员发了通知。当时实业界人士对国共两党内战烽烟又将升起而忧心忡忡。同时,因美货滚滚而来,国家订货顿时停止,市场日促,企业困难重重,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日益破灭。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很想了解共产党有什么主张。10月19日这天,前去听周恩来同志演讲的人空前踊跃,会员都来了,座无虚席;非会员也来得不少,站在窗外,户限为穿。

周恩来同志讲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大势》。他的演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战后工业建设,首先要有和平的局面,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也要民主。中国的资本形成有三种:第一是国家资本,第二是私人资本,第三是合作资本。这三种资本应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而不应该互相排斥和竞争。坚决反对另外三种资本:第一是官僚资本,第二是垄断资本,第三是侵略资本。今后应该发展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在税收和劳工问题上,关税的重心应放在保护民族工业上面,工业税原则应课得比较轻。中国的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该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恩来同志的演讲,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起了深远的影响。

# 重庆开埠与《重庆开埠史》座谈会召开

ZXFK 史讯

2月18日,由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重庆开埠遗址公园联合举办,以《重庆开埠史》出版40周年为主题的“重庆开埠与《重庆开埠史》”座谈会召开。

据介绍,《重庆开埠史》一书以重庆开埠及其影响为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至1911年辛亥革命间的重庆政治史和经济史。该书开启了重庆史研究新步伐,40年来对重庆史研究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座谈会前,该书作者之一、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与数十位专家学者、特邀嘉宾等一起,就《重庆开埠史》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重庆开埠史与重庆城市发展、城市历史和文化等话题进行交流分享,展示了该书出版40年来在相关档案、文献、史料方面的新进展,并分享了该书转化的新成果。

目前该书已呈现多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982年内部发行的《重庆开埠史稿》;198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第二个版本,也是第一个正式版本;1997年重庆直辖,重庆出版社推出了第三个版本;2020年,入选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瑰瀛涛文集》,是第四个版本。今年,重庆出版社再版《重庆开埠史》,第五个版本将很快面世。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书的成果转化多样。以该书为基础,著名导演徐蓓完成了纪录片《城门几多高》。同样以该书框架结构为基础,市委、市政府决定建设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并全面修复了南滨路一线具有百年历史的开埠遗址群。书中记录的那段130多年前的城市历史,得以直观、立体、形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40多年前,当时的市政协文史委和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共同推动重庆地方史资料搜集与研究,对1982年内部发行的《重庆开埠史稿》作出积极贡献。座谈会前,全体与会人员参观了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内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和立德乐洋行旧址。据了解,已建设完成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和已经修葺一新的立德乐洋行旧址,将于今年4月与市民见面。(秦杰)